

清代儒学核心的盛衰

□ 陈 思

核心阅读

清王朝是儒学兴盛和发展的朝代，满洲人凭借儒学政治与文化核心成为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同属一个王朝的纽带，有效治理了中国历史上情况最为复杂的多民族国家，使清王朝登上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巅峰。清代儒学经世致用、注重启蒙，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但因失去治学特点而逐渐走向世俗化和功利主义，在历史变迁中与国家的生命力一起衰竭。

封建专制主义的巅峰

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尊卑有序的家长制全面统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道德规范。隋唐以降，科举制度进而使阶级跃升的管道畅通。无论之后如何战乱纷争，江山易主，儒学核心始终确保了农业中国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清王朝亦如是。

明末大凌河之战，皇太极被明朝军士坚贞不屈的气节深深震撼，认为这是“读书明理之效”，由此开始重用汉臣，开八旗学校，学儒典，从儒礼。明朝灭亡的天崩地坼之际，满洲人面对庞大的农业文明，可作出的抉择不多，他们笼罩在几百年前元朝迅速败亡的阴影中，惟有继承明制，延续儒学的文化与政治核心地位。多尔衮入关之后，原明朝官员一概录用，皇权之下，三省六部有效运转。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南书房、军机处结合，成为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开科取士，“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摊丁入地，永不加赋，引进高产作物，推动中国人口持续暴增；改土归流，加强中央对边疆的统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凭借着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有效性与儒学核心政治的适应性，满洲人迅速统一了中国，整合社会资源，重建家长制社会，有效治理了中国历史上情况最为复杂的多民族国家，使清王朝登上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巅峰。

儒学核心的大一统王朝

满洲人成功进据中原与其军事民族的特性相关，而清政府长期治国理政则是赖其迅速确立的儒学核心政治，并以此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平衡。这一平衡不仅限于满洲人自身，也涵盖了边疆各少数民族。海外清史学派认为，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成功，都没能覆盖东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但事实却相反，清代版图西至雪域，北覆荒原，正是以儒学统摄四方，安抚天下。因为，儒学中至要的“和”即是以差异化为哲学前提的文化主张：“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儒学承认世界的多样性，亦追

求差异性之中的和谐，扩展到政治领域，儒家文化既承认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亦追求并存与融合，以实现国家民族的统一与稳定。

儒化的满洲人谙熟怀柔远人的手段和方式，反客为主，以宗教、文化、风俗、共性为基础，消解族群之间的诸多矛盾，协调边疆与中央的既得利益，促进合作，获得平衡，达成互补，有效维持了王朝的安定团结。孔子的“和而不同”表面上探索的是社会规则，而其内涵却被满洲人泛化，用来达成政治诉求，理顺政治秩序，从而构建大一统的封建多元社会。

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让醉心于武力征服的马背民族转了个弯，全盘儒化的满洲人开始成为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同属一个王朝的纽带。在木兰秋狝的号角声中，热河行宫肇建，长城边塞崩塌，现代中国宏括东亚的万里疆域由此奠定。

经世致用的清代儒学

清初，清政府以明朝灭亡的原因为鉴鉴，认为道德情操的丧失和伦理纲常的废弛是其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因而提倡并推行程朱理学。该派作为道德神学，通过赋予儒家神权而使其抽象化、心性化、逻辑化、真理化，将社会整体价值观在儒学框架内构成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但清初儒学却反而整体转向，兴起注重考据、摒弃空谈、注重启蒙的学风，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理想，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实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对清代儒学的整体发展历程影响至深。清代实学扬弃晚明儒学的晦涩玄理与沉沦萎靡，主张言之有物，客观实证，将儒学哲思世俗化，以天文、地理等自然规律和吏治、典章等社会治理诸多领域为研究目标。黄宗羲提倡以修儒为心学之本，力主穷经、治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本思想，主张“天下之法”，以此限制封建专制，确保民权。顾炎武开风气之先，“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将治学和道德修养与经世济民高度统一。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强调思维与实践的相互作

用，“思学兼致之实功”。

颜李学派于17世纪中叶在中国北方兴起，“实文、实行、实体、实用”，高举实学的旗帜。颜元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批判其空疏，崇尚实学，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重视“习行”教学法，推行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李塨继承并发展颜元的思想，强调因行得知，不能离行言知。“格物致知，学也，知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有益于世道，倡导亲身习行践履。“致知在格物者，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在土地政策上，李塨主张恢复井田制，或限田、均田，视之为仁政，他还反对科举制度，主张乡举里选。

乾嘉学派的影响同时贯穿清中期。在乾隆皇帝大力提倡经学考据的背景下，“古典考据学独盛”。儒家的治学方法复兴了汉代的训诂、考订，注重联系实际证据，理论创见趋于谨慎。该派同样主张经世致用，“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结合，学派文风朴实简洁。因上述特点，也被称为“汉学”“考据学”“朴学”。吴派和皖派是乾嘉学派的两个重要支流。吴派奉汉代经学研究为经典，对其名物训诂、典章制度述而不作，“唯汉是信”，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皖派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直探儒家经典义理，重视思想和理论建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乾嘉学派兴盛了百年，在训诂、考据、音韵、文字、历史、地理、考古、数学各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

今文学派昌兴于两汉，因与迷信神学合流而衰，又复兴于清中期，成为道光朝儒学的重要流派。今文学派以《春秋》公羊义理为宗，阐发政治主张。龚自珍、魏源发展了今文学派，与现实结合，使其逐渐变为一种政治学说，对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产生了深刻影响。后康有为托“公羊改制之义”推动戊戌变法，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儒学贯穿了整个清代，主导了社会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始终没有出现过大的分化与因素。各派皆由经世致用发端，分化之中仍保持兼采汇通，最终同质化。失去治学特点的儒学逐渐走向世俗化和功利主义，生命力枯竭，在新思潮与社会变迁中步入末路。

清代儒学的终结

清王朝国祚268年，与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一样，经历了完整的盛衰周期，其历史因素也因几千年来儒家政治核心的局限性而大致趋同。政治的僵化与文化的专制，决定了清代走不出历史周期率的迷途。然而，世界正在与时俱进。康熙皇帝为诸宋儒和岳麓书院题写“学达性天”匾额的时候，牛顿提出了三大运动定律。乾隆皇帝设立四

库全书馆之时，伦敦证券交易所成立。中国在清全盛时期，即因文化的桎梏种下衰退的种子。

经济上，清代前期经历了土地资源重新分配整合而发展至全盛，在后期经由土地大规模垄断兼并所导致的农民革命而逐渐衰落。清王朝错过了工业革命，始终是农业文明，也终结于农业文明的宿命。

政治上，清王朝前期因继承完整的儒家体系而构建了稳定高效的政治体制，在后期也因儒学的僵化而沉沦。清王朝没有启蒙运动的土壤，始终是儒家社会，也终结于儒家社会的宿命。

儒学的核心使命是发挥高台教化，建立秩序，修己安人的社会价值，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垂直管理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其学术崩坏，社会体系即瓦解。“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清末，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内外各种复杂的冲击，儒学文明核心逐渐式微。儒学丢弃了经世致用这一最后赖以生存的基础，再度空泛化，玄学化。儒生沉迷于形式得利，沦为犬儒，学术研究没落为出将入相的手段，失去了治学精神。

儒学核心地位丧失之后，开始了制度性的剥离。1898年，光绪皇帝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这所综合性大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开端。尽管在开学典礼上，学生对着孔子像行三拜九叩大礼，西方教师亦鞠躬致敬，但是中国传统官学体系此刻正在解体。戊戌变法失败后，冯桂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张之洞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上述理念经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支持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的实践，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路径。然而“中体”始终没能发挥纽带的作用，儒学核心在20世纪初难以为继，没有成为可行的过渡性模式。这一时期，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儒学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近代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也彻底冲击了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

儒学支撑了华夏文明2000年的运转，当其架构崩塌之时，中国社会即开始重组。随着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入侵古老中国，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清代中国思潮混杂，大门洞开，秉持儒家核心政治的清政府最终无力支撑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自此落下帷幕。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与金、辽、元大相径庭，却与唐、宋、明殊途同归，其国运随儒学的兴而始，亦因其衰而终。

史镜

秦变

大国兴起，求同而立，其道在一，其要在容。秦超越六国，金戈铁马的背后是求同聚异。以诚换诚，以真换真，不舍其小，故成其大，广阔胸怀生发出大国崛起的万千气象。

二次开放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继位的第一年，水师郑国以修渠为名，实施疲秦之计，事情败露，举国哗然。从理性出发，秦王听从郑国之言，不究其罪，反加其荣，顺势而为，成就精品工程，并冠名“郑国渠”。郑国可用，何人不可用？这是何等胸襟，这是秦国的“郑国”。

客一人易，客天下难。秦对于外来之臣的疑虑时隐时现，没有随着继续修筑郑国渠而停止。秦王政九年，突发嫪毐之乱，次年吕不韦罢相，二人原本秦之重臣，多用六国之士，此时再成池鱼之祸。保守势力以此为由，要求驱逐多年来为秦效力的各国客卿。大秦上下，情势汹汹，疑六国之士，下逐客之令，驱入秦之众。

李斯原为吕不韦门客，又是楚人，也在被逐之列，感慨之余上书秦王，是为《谏逐客书》。秦自献公以后，敞开怀抱，海纳百川，渐成王霸之业。逐客之令“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取西向”，意味着全面否定开放国策。在聚合发展的关键阶段，向左还是向右，秦站在了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谏逐客书》至情至理，但千古雄文须待千古之人。秦王深受感动，派人急速至郿县，请李斯回咸阳，废逐客之令，再兴宏图。这是秦变百年后的二次开放，稳定了嫪、吕之乱后的国内政局，六国之士安心奉秦，画出助秦兴秦的最大同心圆，再次燃起搏击勇进的热血豪情。

三纳忠谏

包容意味着改变，最难处在于改变自己，在刚柔之间兼收并蓄，方可行稳致远。这是对为政者的考验，也是对大国治理韧性的考验。

嫪毐之乱，虽然有惊无险，但是家事国事、面子里子，酸涩苦楚，纷乱如麻。肃清朝堂内外后，秦王将深陷嫪毐事件的太后拘于旧都雍城，国家安定和人伦之理难在取舍之间。20余位大臣死谏，来自齐国的宾客茅焦巧妙点醒事中人，“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血气秦王幡然醒悟，卒火包含宇内之心，亲自到雍城迎接太后回咸阳甘泉宫。

公元前225年，大秦已经看到统一天下的曙光，最后还有实力的对手只剩楚国。秦王政召集群臣，商讨灭楚方案。新锐将领李信认为20万人马足矣，老将王翦坚持必须倾国而出，非60万秦军不可。秦王认为王翦老不靠谱，便派遣李信和蒙恬率兵伐楚，结果惨败。嬴政得知战况后，震怒之余很快冷静下来，亲自到王翦家乡频阳向其道歉，并许以优厚条件，请他出山。王翦是有福之人。秦昭襄王时代的白起，同样都是提出不同意见，同样都是有先见之明，白起含冤杜邮自尽，王翦终成灭楚大业。李信虽然战场失利，但后来也有机会再建功业。

李斯之谏、茅焦之谏、王翦之谏，一一容纳，三次转身，次次精彩，聚精会神走好了发展的每一步。秦灭六国，积怨已深，后世之人乐于将嬴政形容成刻薄寡恩之人，“秦王为人，蜂准，长

大国求同

□ 崔 庆

目，挐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此语出自魏人尉缭，这段外貌描述成为后世对于秦王政的印象模板。尉缭在觐见嬴政之后，认为和秦王难以长期相处，并以此为理由，不告而别。但秦王非但不怒，而且派人追回尉缭，授之国尉，并把他也看做和李斯相提并论的重臣。古往今来，不知几人能够容如此无礼之人。爱才之心、宽容之度，成就秦王，也成就大秦。

家书秘密

客人何以为大？容臣，容士，还需容民。事须人为，民为邦本，伟大的帝国往往从包容万民开始，秦之兴起也源于此，得民有道猛于虎狼之师。

云梦睡虎地秦简内容丰富，其中包括秦军士兵的家书。书信之中，秦军士兵“黑夫”和“惊”兄弟二人向大哥“衷”问候家人、询问家中情况，恳请家中寄送钱物。据考证，家书由秦军驻地淮阳发往士兵的家乡安陆，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云梦县，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23年，正值秦将王翦统帅大军60万进行灭楚之战。

家书透露出了一个关键信息，士兵“黑夫”和“惊”来自安陆。那么安陆在哪里呢？安陆得名于陆浑戎。公元前525年，晋国攻伐陆浑戎，其残部进入楚国，被收留安置，其所在之地被称为“安陆”。公元前278年，秦发动了对楚国的郢郢之战，安陆并入秦土。50年时间，经过两代人的融合，安陆等楚国故土已经开始为秦输送兵员了，“黑夫”“惊”是在楚地成长起来的“秦二代”，他们虽然留的还是楚人之血，但已经完全以为大秦效力为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坚不摧！

这种整体融合不是单独个案。秦吞并巴蜀，也是经历大约40年时间的消化整合，巴蜀也成为秦国“熟地”，为秦军提供了10万精锐，共同伐楚。当然，秦融合新土新人也有急就章。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进入到决战阶段，关中已无可调之兵。昭襄王亲临河内，以非凡气魄、用赐爵一等的方式对这块“生地”进行战略总动员，尽发河内15岁以上男子，组成战略支援力量，对围困已久的赵军发起最后致命一击。

包容的广度，融合的深度，决定了发展速度，这是秦的关键软实力。秦墨有缘，墨家倡导尚同、兼爱，深深影响了秦国。可以舍弃赋税之利、招徕三晋之民，可以一视同仁、教化六国之众，打开了秦国上升的结构性空间。秦有天下，既是一部奋斗史，也是一部修炼史，大国求同，用恢弘气度打造出了坚实的发展共同体。

□ 王 涛 车 耳

东晋时，有位母亲姓湛，她的故事被载入《晋书·列女传》，而这位了不起的母亲湛氏，培养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他就是东晋时期的名将陶侃。陶侃从军30余年，多次平定战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他精勤于吏职，为人所称道；其治下的荆州，史称“路不拾遗”；他“喜文辞，行文如流”，所著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湛氏、陶侃以他们的言传身教成就了一个著名家族——浔阳陶氏，也造就了许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陶侃的曾孙陶渊明。世人皆知陶渊明洒脱豁达，以“陶逸诗人”“田园诗派创始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和诗歌“篇篇有酒”等扬名，但鲜为人知的是陶氏家族的文化传承。湛氏、陶侃、陶渊明等陶氏先祖的家教故事深深影响着陶氏后裔，后代把湛

氏、陶侃、陶渊明等人的思想精神转化为家规家训的具体内容，逐渐形成了以“诚修身”为核心的陶氏家训。比如家训中有云：“修身不可不诚”“人当爱惜身名，谨言慎行”等等。其中最令人感叹的是湛氏“截发延宾”以及“封坛退鲋”两则言传身教的故事。

“截发延宾”是湛氏言传身教，告诫儿子诚信交友的故事。故事发生于陶侃尚未出仕的一个冰雪积日的冬季，鄱阳郡孝廉范滂途经陶侃家，仓促之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剪下自己的长发卖掉换酒菜，砍下自己家中屋柱劈开当柴火，还将坐卧用的草垫铡碎当马料。后来范滂得知湛氏所为，既感叹其见识，又深愧其厚道，感叹说：“没有湛氏这样的母亲，生不出陶侃这样的儿子。”而“封坛退鲋”则是湛氏严慈相济，教导儿子诚信为官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陶侃年轻时，彼时陶侃任职浔阳县衙小吏，掌管市交易，

常有下属送东西给他。有一次，一位下属送了一坛鱼鲋给陶侃，孝顺的陶侃马上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便嘱托乡人带给母亲。谁知母亲却原封不动地将这一坛鱼鲋退了回来，并且写了封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官吏，假公济私把鱼拿来送给我，非但不能让我高兴，反而更增加我的困扰。”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鲋和回信，大为震动，更愧疚万分。这使他下定决心，一生遵循母亲教导：清白做人，诚信为官。

天地悠悠，千年岁月倏忽而过，“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已然找寻不见，但浔阳陶氏先祖留下的诚信精神财富却实实在存在，并代代相传。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的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特色。我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不少是通过家训来实施的，从而形成了浩繁的家训文献。除了《陶氏家训》外，还有《颜氏家训》《了凡四训》

《朱子家训》《曾国藩家训》等等。其中，诚信作为儒家伦理的主要德目之一，是家训中治家教子的重要内容。这些家训中记载着父母对孩子谨守诚信的谆谆教导。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诚信立身、诚信交友、诚信为官和诚信经商等方面。

通过湛氏言传身教、严慈相济的方式影响并教导陶侃的事例可以看出，传统家训中所蕴藏的大量诚信文化要素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其文化生命力，恰恰相反，在加强诚信建设的当下更是无比珍贵的文化资源。传统家训所记载的诚信教育的方式方法，贴近中国人的生活实际，符合道德文化教育的规律性，具有文化共时性的特点，值得传承与借鉴。

信用故事

